

中国民间文化

● 民间礼俗文化研究



ZHONGGUO MINJIAN WENHUA DI 9 JI

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
上海民俗学会编
学林出版社

中国民间文化

——民间民俗文化研究

1

1993

(总第九集)

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
上海民俗学会

学林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113号

责任编辑 郑土有

封面设计 俞子龙

中国民间文化(93/1)
——民间仪俗文化研究

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
上海民俗学会编

学林出版社出版

上海文庙路120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联昌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8.125 插页2 字数220,000

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1,500册

ISBN 7-80510-831-5/G·202

定价: 6.70元

《中国民间文化》编辑委员会

主	编	姜	彬		
副	主	编	王文华	陈勤建	
编	委	王文华	任嘉禾	陈勤建	
		罗永麟	郑硕人	姜	彬
		魏同贤			
编辑室主任		郑土有			

目 录

●民俗理论研究

突破与深化：中国民俗学研究面临的新

课题陶立璠(1)

论宗教与民俗语言文化曲彦斌(17)

陕北民俗的多元化特征段双印(35)

●原始信仰民俗研究

巨石遗迹：史前的文化符号

——石头的民俗象征研究之一刘锡诚(53)

石崇拜产生的思维基础与民俗

心理王 立 王之江(71)

古代东夷族的太阳图腾及相关事象

——兼论信仰习俗的丛生性李炳海(83)

河姆渡“双鸟昇日”探幽陈忠来(91)

中国海神信仰探析郭泮溪(102)

钟馗考实

——兼论原始社会玉琮神像性质王正书(114)

●生活民俗研究

品幽尝绿话茶经

- 江苏南通饮茶习俗研究……………张自强 杨问春(125)
- 四川建房民俗探索……………朱仕珍(140)
- 山越遗裔的信仰习俗及服饰……………王 水 王召里(152)
- 宁波民间医药习俗调查……………应长裕(171)
- 金平哈尼族葬礼换装的象征意义……………邓启耀(203)

●节日活动调查

- 孙思邈的传说与耀县二月二庙会…宁 锐 王明泉(215)
- 溱潼清明会船节调查……………许谷梁(224)
- 钟管乡符咒巫术活动……………黄立峰(232)
- 化身为“乞丐”的来访神
- 从民间“新年财神登门”习俗说起……………黄 强(245)

突破与深化：中国民俗学 研究面临的新课题

陶立璠

一 简单的回顾

中国现代民俗学，发端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，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。和世界民俗学的发展相比，中国民俗学的觉醒与起步并不晚，而且在二三十年代，中国老一辈民俗学家，孜孜追求世界民俗学发展的步伐，开拓进取，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，这些无庸赘述。现在仍健在的中国老一辈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、容肇祖先生、杨堃先生等，是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的最好见证人。但是，中国民俗学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，原因人所共知。直至粉碎“四人帮”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天空突然开朗。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中，中国民俗学终于得到了新生。不过，当1979年中国老一辈民俗学家钟敬文、顾颉刚、杨堃、容肇祖、常惠、杨成志、白寿彝等七位教授，提出恢复和重建中国民俗学机构的倡议时，大多数民俗学研究者的学科意识还很淡薄，甚至心有余悸。但民俗学学科毕竟是一门具有强烈生命力的学科，在这片荒芜的田野里，恢复开垦和播种，需要胆识和勇气。在将近十年

的恢复和重建中国民俗学学科的日子里，钟敬文先生如同他在二三十年代的所为一样，筚路蓝缕，就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众多问题（如机构建立、人才培养、课题研究等方面），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讲话。^①他还主持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，重视人才培养，积极沟通国际民俗学界的交流。这就使中国民俗学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又一次与世界民俗学取得了同步发展。

以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为标志，十年的生息和发展，出现了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。如在机构建立上，现在除中国民俗学会外，全国已有二十六个省（自治区）、市建立了省级民俗学会，目前建立学会的工作正在向地区和县一级发展，在人才培养上，全国已有近四十所大学开设了民俗学课程，十多所大学培养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方向的硕士学位研究生，北京师范大学还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。民俗学理论研究十分活跃，基础理论研究和专题研究受到重视；民俗志、民俗丛书（包括理论）大量出版；应用民俗学、地域民俗学被提上研究日程；民俗刊物、民俗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；民俗学的国际交流在不断加强。凡此种种，展现出中国民俗学的光辉前景。和世界民俗学的发展相比，中国民俗学正处在一个高涨的时期，这从多种社会科学对它的关照，民众普遍兴起的民俗文化意识中得到证明，这一点令国外学者也有些羡慕。

二 中国民俗学面临的新课题

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，又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几千年的民俗传统文化，无疑是一座琳琅满目、异彩纷呈的文化宝库。与之相比，中国民俗学的研究，犹如巨人

^① 见钟敬文《新的驿程》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。

与侏儒。加之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,传统民俗文化越来越受到巨大的冲击,因此,摆在中国民俗学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,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。

1. 关于基础理论研究

基础理论对于任何一门学科都是至关重要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基础理论的建设,不仅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,而且关系着这门学科未来的发展。十年来,中国民俗学基础理论的研究,应该说有了长足的发展,出版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。但远不能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。有许多理论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。比如:关于民俗与民俗学的概念问题,至今还在争论之中。结合中国的实际,作为学术名称的民俗学,它的含义、对象、范围究竟是什么?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,钟敬文先生就曾提出过“民间文化”的概念,甚至想用这一名词取代“民俗”一词。八十年代,钟先生又重新提这一问题。他曾在《话说民间文化》一书的《自序》中说:“从三十年代起,我就注意到广大民众自己所创造、享用和继承的文化,并且创用了‘民间文化’这个新术语……我甚至拟用这个名词去代替‘民俗’一词,而把民俗学称为‘民间文化学’。现在考虑起来,当时那想法是合适的。”^①钟敬文先生在这里提出,用“民间文化学”代替传统“民俗学”概念的直接理由是:“几十年来,世界学界民俗学的范围在不断扩大,以至于将使它包括民间文化全部事象在内了。”^②很明显,这一扩大了民间文化范围,已和传统的民俗学研究范围,有了很大的区别。它包括了民间工艺、民间艺术、民间科学技术和民间组织等许多方面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,早期的英国民俗学家斑尼(C.S.Burne)女士,在其所著《民俗学概论》中说:“民俗包括民众的心理方面的事物,与工艺上的技术无关。例如民俗学家所注意的不是犁的形状,而是用犁

①② 钟敬文《话说民间文化》,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。

耕田的仪式；不是渔具的制造，而是渔夫捞鱼时所遵守的禁忌（taboo）；不是桥梁屋宇的建筑术，而是建筑时所行的祭献等事。”^①显然，这和我们今天的理解完全不同。另外，就中国文化的整体而言，绝不是单一层次的，它包括了上层社会文化，中层社会文化和底层社会的文化。上层社会文化，是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；中层社会的文化是城市人民和商业市民的文化；底层社会文化是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。^②而所谓“民间文化”，自然包涵着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。这是当代民俗学研究层次扩展所造成的必然结果。显然“民间文化学”比之“民俗学”在术语概念上，要明确得多。自从1846年英国民俗学家汤姆逊（V.J.Thoms）提出“folklore”这一学术名称，世界民俗学的发展，已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，不论国外社会学科关于民俗学的归属如何划定（如归于文化人类学、民族学等），中国民俗学发展到现在，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，根据民俗学传统的研究对象和今天的发展，将其称为“民间文化学”，未尝不可。

此外，还有民俗学与风俗学的问题，也已经提出。民俗学传统上被理解为研究民间风俗、习尚的学问。很明显，它的研究局限在中层社会文化和下层社会文化之间，上层社会文化被排斥在外。上层社会的文化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，其中的上位文化，自然不属于民俗学研究的范畴。但上位文化与下位文化之间，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，官方仪礼与民间仪礼之间，从来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如：一年中的岁时节日，有关人生的仪礼等等，无论上层统治阶级还是一般民众都要依例进行，只不过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区别罢了。所以，有人提出用“风俗学”取代“民俗学”，认为这样可使研究的范围更扩大一些，研究更自由一

① 方纪生《民俗学概论》第2页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资料室编印。

② 钟敬文《话说民间文化》，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。

些，这也不是没有道理。

最后，还有“民俗文化学”的概念，也值得讨论。“民俗文化”概念，近几年来，运用得比较广泛，范围所指也比较宽泛。伴随着中国旅游业兴起的民俗文化热潮，方兴未艾。“民俗文化学”概念，必然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。

除了民俗学的概念之外，关于民俗的特征、功能、分类、民俗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关系、民俗学方法论的问题，也都显得十分突出。应用民俗学和地域民俗学的研究，越来越受到重视，如语言民俗学、文艺民俗学研究，已有专著问世。民俗发展史、民俗资料学的建设至今还是一个空白。中国民俗学发展到现在，应该建立自己完整的体系和理论框架，以指导学科的研究。

2. 关于历史性与现在性问题

民俗学研究领域的确定，是摆在中国民俗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实际问题。它关系着中国民俗学的性质。时至今日，文化人类学派“遗留物”观点的影响，并没有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完全消除。但时代毕竟在前进，民俗学研究的领域，也在不断开拓，在传统与现实面前，中国民俗学在作着自己的选择。1984年，钟敬文先生在《民俗学入门·序》中说，民俗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，它无疑是一种“现在的”学问，而不是“历史的”学问。“这两者的不同，正像‘生物学’与‘古生物学’的不同一样。民俗学的记述和研究，是以国家民族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象为对象的。”^①这标志着中国民俗学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。这种研究领域上的转轨，将目光投向活生生的现实生活，意味着民俗学已不是一种陈旧的、僵死的学问，而是一种新鲜的、活泼的学问。并在某种意义上，又一次和世界民俗学取得同步发展。

民俗学的现在性，标志着中国民俗学未来的发展方向。但这

^① 《民俗学入门》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。

并不排斥民俗学对传统民俗事象的研究。中国民俗学的研究，应该关照本国的国情，同时也要关照民俗本身的特征。因为民俗具有传承性，不了解民俗的历史，就无法把握民俗的现实。所以我们在强调民俗的现实性时，对传统的民俗事象同样要给以重视。从这种意义上讲，中国民俗学的研究，需要从文献、传统和现实民俗事象的调查三方面入手，将历史的与现实的民俗研究结合起来，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。

3. 关于描述与研究问题

所谓描述，是指对具体民俗事象的观察和记录。民俗，是靠语言和行为传承的文化行为模式。用文字作符号，将民间传承的民俗文化现象，源源本本地记录和描述下来，是相当困难的。即便是使用现代化的录音机和摄像机，虽可补充语言描述的不足，但它仍不能脱离语言和文字的帮助。民俗学研究，历来十分强调“田野作业”，它强调对民俗事象的考查与描述，是民俗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功。目前，中国民俗学的“田野作业”水平，和国外民俗学相比（如美国、日本等），虽然做了许多工作，但基础还很差。新中国建立，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，但由于过去对民俗学所存在的认识不足和某些偏见，各级文化部门并没有对中国各民族的民俗作过全面的普查，甚至连地区性的专门普查也很少，所以我们对中国民俗文化的整体，对它的源流和沿革，对各地区、各民族民俗文化的分布和特点，均不甚了了。中国民俗文化，历来存在着多元一体的格局。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民族民俗文化，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；而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，在历代中国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，也同样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。春秋战国时代，赵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，开各民族民俗文化交流之先河。自此以后，历朝历代的民俗文化，都是在各民族的共同参与中形成和发展的。忽视这一特点，将中国民俗学看作是汉民族民俗学，且主要以研究汉民族民俗为主，是不对的。

这也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一大弊端。

我们这样讲，并不否认中国民俗学工作者在以往的“田野作业”中所作的工作。诚然，目前所出版的民俗志、民俗学丛书已经不少，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但今天回过头来再读这些著作，就会觉得，以往在民俗的考查与描述中，存在着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。其中最突出的是，大多数民俗调查者对具体民俗的记录，还停留在宏观描述的水平上，缺乏对民俗事象的深入细致的描述。也就是说，表层的描述已作了不少，深层的细节描述和心理描述却显得不足。这不仅涉及到民俗学描述的科学性，也涉及到民俗考查、描述的技术和技巧问题。民俗，从来都是一种时空文化的连续体，它所包含的层面是极其丰富的，既有物质的因素，也有精神的因素，物质的因素是表层的，精神的因素则是深层的。民俗考查不仅要注意到这两个互相联系的层面，而且要将这种联系精细地描述出来。比如：我们对居住民俗的考查与描述，以往大都集中在民居样式特征的描述上，如蒙古包、傣家竹楼、吊脚楼、四合院等，我们所见的宏观描述已经不少。实际上，民居习俗所包含的范围是很广的，从微观考察与描述的角度它应包括：1.居住地周围的自然环境（土质、气候、水利），各类资源，生产状况（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各业），交通设施等。2.住宅的布局、结构（必要时要绘出平面或立体图），住宅内房间的分配、位置、名称，供何人使用（区别不同身份）。3.火塘和灶的位置，有无特别的意义，有无灶神。4.屋内家神供奉的位置。5.家具的种类、名称、制作、使用。6.住宅的修建（材料、过程）和仪式。7.房屋建筑的类型，不同身份的人家采用不同的类型。8.附属设施（包括畜圈、厕所、仓库等）。以上所列还只是考察要目，具体的考察可能还要细致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全面把握某一地区、某一民族民居文化的整体，才能将表层与深层的描述与研究结合起来。描述永远是民俗学研究的基础，没有好的考

查与描述，民俗学研究就不能深入下去。中国民俗学发展到现在，必须在“田野作业”中加强微观考查与描述，否则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和发展将会受阻。

4. 关于方法论问题

方法论问题，在最近十年的中国民俗学研究中，得到了应有的强调，从而促进了学科的发展。方法论的本质是世界观问题，也称其为方法观。具体到民俗学研究，是研究者如何看待民俗文化的性质，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。这个问题，至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。许多人轻视民俗文化，认为民俗文化是庶民的底层文化，是一种“粗俗”的创造，不能登大雅之堂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中国的民俗文化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中，有时政府部门还采取社会动员的方法，不加区别地将一部分民俗作为封建迷信加以革除，使许多优秀的民俗文化，得不到应有的保护，更谈不上用心的研究。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：劳动创造了人类，创造了历史。劳动者在创造社会历史文化的同时，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民俗文化。中国文化就其整体而言，包括了“俗文化”和“雅文化”两类，两类文化相比，“俗文化”是养育千百万人的文化，它比之“雅文化”，毫不逊色。“俗文化”是“雅文化”的源头和母体。“雅文化”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后，而在此之前，“俗文化”却早已产生，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，一直绵延不断。一种很有趣的现象，表现在考古学方面。考古学分地质考古、生物考古、文化考古等。在文化考古中，我们对地下发掘的文物，向来视为珍宝。但迄今为止，中国大部分的文化考古资料，是从古代墓葬中得到的。那里的确有不少稀世珍宝，而这些珍宝恰恰是随着古代的丧葬习俗，被埋入地下的。每一种葬式及其随葬器物，都包含着当时人们功利上的目的和观念中的信仰在内。这使各类葬式和随葬器物，具有了文化史的价值。我们应当感谢古代上层统治阶级的厚葬习俗，它使价值连城的器物能得以保存到今天，并帮助我们

去认识昨天。考古的目的，是要认识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，认识当时民俗文化(包括上层社会的文化)的本来面貌。换句话说，古代葬俗和随葬器物，原本是当时社会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，它只不过是随着当时的葬俗被转入地下而已。今天，我们站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，审视民俗文化的发展，对民间文化财富，再也不能采取漠视的态度，而要像对待地下考古文物那样，对目前劳动者创造和享受的文化，同样应加以保护。1986年6月26日，全国政协文化组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(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)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，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了“保护民间文化座谈会”，这是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专家会议的建议精神召开的。联合国专家会议，曾建议世界各国政府，通过议会立法的形式，保护民间文化。时过七年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《关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建立我国各民族民间文艺、民俗馆的提案》，并未得到落实。而保护民间文化，确实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。和世界发达国家对于民间文化的保护相比，我们的这种意识正在觉醒，但存在的差距是很大的。如不认真解决立场、态度和认识问题，任何方法都只是一种很有限的努力。

方法论，是民俗学研究中的指导思想和原则，但它不能代替民俗学的具体研究方法。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，如田野作业法、比较研究法、历史地理研究法等。无论哪种研究方法，都应有自己的研究流程和技术。比如，民俗学的田野作业，它不只是要求从事民俗学研究的人员必须深入社会实际，而且要求考察者具备一定的调查技术，要讲究田野作业的流程。目前，中国民俗学的田野作业，尚处于一种自发的、盲目的状态之中，许多考察者缺乏基本的训练。他们仍然习惯于使用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，即问题调查法，而忽视田野调查的独特技术和方法。这必然要影响到考察的效率和质量。又如：历史地理研究法，在民俗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特别是在民俗的传承和传播研

究中，它可以纵横驰骋。芬兰历史地理学派创造了这种方法，用于民间故事的研究，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“AT分类法”，它对世界范围内流传的民间故事，作类型的归纳和分析，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功。民俗和民间故事一样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也形成了一定的类型，是否也可以运用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，将其作类型的研究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如：居住民俗中的“蒙古包型”居住样式，代表了游牧、狩猎民族的文化特征。这种居住样式，在中国北方的鄂伦春、鄂温克、赫哲、蒙古、哈萨克、裕固，西南的藏族中都有传承，其基本建筑样式大同小异。中国境内各民族，对这种建筑样式有“撮罗子”、“蒙古包”、“毡房”、“帐篷”等不同称谓，这也表现出各类“蒙古包”在结构上的差异。蒙古包，也是一种世界范围内传承的民俗文化现象。在亚洲各地，在非洲、美洲、澳洲，凡是存在着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地方和民族中，都可以找到这种居住样式。民俗学的类型研究，目前在中国，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，它需要民俗学研究者去尝试和探讨。民俗的类型研究，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某一民俗事象的原始形态，原始流传地，它的历史演变和发展；而且有助于横向的研究各民族民俗之间的交流和传播。

最近几年来，关于方法论问题，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已受到广泛的重视，随着民俗学学科的发展，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一定会很快出现。

5. 关于都市民俗学

都市民俗学，是随着西方国家文化人类学的研究，在都市人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学问，是民俗学的一个支学。都市民俗，是随着都市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文化现象。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国家，古代都市最初是在农村乡镇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所以中国的都市民俗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农业社会的特点。从民俗的传承角度来讲，中国都市的市民（即民俗的传承

者)大都由农民转化而来,他们在转化为都市市民的过程中,自然将农业民俗带往城市,构成日常生活的基础。自都市形成之后,真正作为都市民俗文化的一部分,是小手工业者的民俗和商业市民的民俗,但作为已往都市民俗主体的,却仍然是农业民俗。这就是中国传统都市民俗的特点。中国的都市民俗很早就已形成和发展了,然而从来没有将它作为民俗学研究的对象。在中国古代文献中,关于都市民俗的记载并不少,特别是宋代以后,如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武林旧事》《都城纪胜》《宛署杂记》,清人关于北京都市民俗的记述著作更多。此外,还有许多专门的关于某些都市民俗事象的著作,如清代李斗的《扬州画舫录》、近人张江裁的《天津杨柳青小志》、间园菊农的《燕市货声》、望云居士的《天津皇会考记》等等,都从不同角度记述了都市民俗。这些为我们研究古代都市民俗,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。如果说中国传统的都市民俗,是以农业民俗作为主体的话,今天现代化的都市,就与传统都市大不相同了。在现代化的都市里,原属于农业民族的民俗,越来越少,而代之以高度发展的工业产业和商业民俗。现代都市,一般都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,如果说,在传统的都市里农业民俗文化起着主导作用的话,那么在现代化城市里,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,以及现代化城市在政治、经济上的优势,都市民俗已在民众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,它不仅改变了原都市文化,而且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参与和影响农村的民俗文化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这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。中国民俗学,已在强调它的“现在性”,强调它的研究对象“是以国家民族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象为对象的”,这就不能忽视都市民俗文化,对传统农业社会民俗文化所带来的全面冲击和影响。目前,从民俗发展的态势来看,新的都市民俗文化已在左右着农村文化。如果说,传统的都市民俗文化的源头在农业民俗的话,而今天农村新的民俗文化,已经或正在改变着原来的文化模式,转而